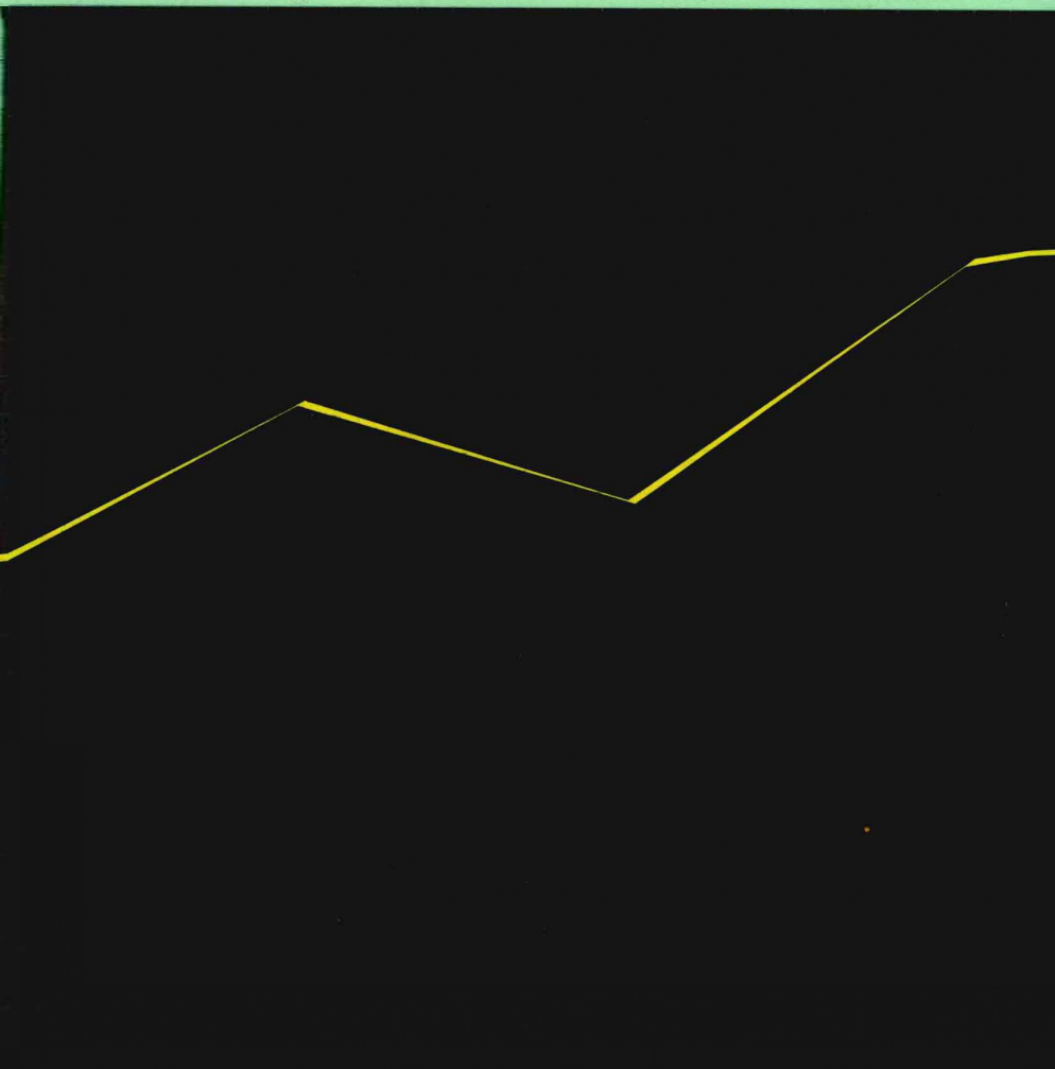


台灣經濟發展 論文選集

王作榮／著



王作榮／著

台灣經濟發展論文選集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時報書系 ④

臺灣經濟發展論文選集

著者 王作榮

發行人 儲京之

出版者 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 臺北市大理街一三二號

電話 三〇六六八四二

郵政劃撥 一〇三八五四

印刷 文群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 臺北市萬大路七一巷二二號

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年八月二十日

三版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四月二十日

登記證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〇三四號

定價新臺幣二二〇元整

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調換

謹以此書紀念

亡弟王 中。他於中華民國十二年九月五日（農曆七月二十五日）出生於湖北省漢川縣西王家村，於六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農曆元月二十日）據說以腦溢血病亡於青海省海西州二〇一勞改農場，葬於青海省第八勞動改造管教支隊直屬七大隊墓地，享年五十五歲。亡弟於民國三十五年畢業於國立中央大學法律系，隨即參加司法官考試及格，任首都地方法院檢察處檢察官。三十八年南京失陷前乘最後一班火車逃往上海，至鎮江交通中斷，折返南京，遂陷中共之手，為中共南京軍管區司令部以反革命份子罪名判處徒刑十五年，遣往青海勞改農場勞改。民國五十五年十月十七日刑期屆滿，奉令原場就業，繼續勞改，以迄死亡。終身未娶。

胞兄

王作榮謹述

民國七十年
八月一日於臺北

增訂再版序

民國六十一年我收集了自民國五十三年至該時在各報紙所發表的關於臺灣經濟發展的論文，印了一本書，書名為「臺灣經濟發展論文選集」，一共印了二千本，半賣半送，至六十五年告罄。以後書店、友人、社會人士及學生常有電話查詢購書，均以無存書相告，心中頗為歉然。至去年冬，又有友人及學生來電話查詢，乃決心將六十一年以後陸續發表之有關文章一併彙集，發行增訂再版。

此書所選各文代表我對臺灣經濟發展的一貫主張，其中有若干已見實行者，亦有若干未見實行者。已見實行者，讀者不妨將現實狀況與書中主張相對照，即可了然。這當然不是說政府採納了我的若干主張，而是經濟發展的演進有一定的軌道可循，到了什麼望，情勢便會逼着人走上那一條路，違背者不祥，能順應者亦是俊傑；我們終不失為俊傑。

未見實行者有二項最令我關心。一為公務員的甄選與訓練，這是建立一個廉能政府處理現代國家政務，領導國家前進的基礎與起點。我約在二十年前即痛感中上層合格公務人員的

缺乏，而在「臺灣經濟發展之路」一文中提出看似幼稚，而卻絕對正確的建議，惜未受到重視。現在在此一方面所遭遇的困難及其對國家進步所造成的阻碍，有目共覩，而負領導責任者必然身受其苦，不堪言狀。

另一爲建立適合現代國家需要的各項制度。建立制度是建立現代國家的必備條件，沒有制度，一切都談不上。我於民國五十九年返國時，曾奉派赴日、韓考察，當時擬網羅一批國內的財經專家至日本作深入的研究，詳細搜集資料，携回國內予以消化，再參考其他國家情形，針對國內實況，將各種必需的制度一一建立起來。我在聯合國亞洲暨遠東經濟委員會工作時，即注意到有二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可供我們參考：一爲以色列；一爲日本。關於以色列的資料奇少，日本資料亦不多，但凡經過我之手或我能見到者，必然留存一份備供我國之參考。赴日考察，正合我之心意。不料受到誤解，遂未能如願。這幾天正讀到伏格爾：日本第一：對美國的教訓 (E. F. Vogel, Japan as Number One: Lessons for America) 一書，要美國如何向日本學習，對照國內實況，歲月蹉跎，豈僅是我個人的損失，亦國家之大不幸。

以上兩項：一爲人事；一爲制度。然而建立一個現代國家雖然千頭萬緒，變化多端，分析到最後，不過人事與制度而已。

王作榮謹序

民國七十年八月
於臺北寓所

初版自序

一九六七年六月以阿之戰，以色列四面受敵，退無死所，哀兵應戰，感人故事極多。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個服預備役的連長，爲一畫家。戰爭發生時，正挈家携眷在加拿大蒙特婁世界博覽會以色列館工作，待遇優厚，生活悠閒。但一聞戰爭爆發，立即以電報向政府報到，並即隻身飛紐約，以最快捷途徑，飛回以色列。於飛機到達特立維伏機場時，一輛吉普車連同全副作戰裝備，已在機邊等候，三小時後即在第一線指揮全連軍隊作戰。誦兒時所讀木蘭詞：「萬里赴戎機，關山渡若飛」，使人興起以色列的興亡就肩負在這一卑小而偉大的連長身上的感覺。五十之年，壯心未已，當時正寄食海外，感觸良多，對那位以色列的連長能有此際遇，不勝羨慕之情，也影響了我以後的決定與遭遇。

遠在民國四十七、八年，常有機會與故尹仲容先生商討當時所發生的經濟問題，分析問

題發生的原因，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而每提出一解決辦法，不是涉及某一人事，便是涉及某一機構，無法逾越，問題也就無法解決，終至相對黯然。因此痛感欲求經濟之健全發展，建設一現代國家，不能單從經濟方面着手，必須要有一全面革新，而全面革新工作又當從建立現代的制度開始。民國四十八年八月，尹先生在聯合國中國同志會以「臺灣經濟十年來之發展與檢討」為題發表演講，即指出：

「過去十年臺灣經濟發展的最大失着，是沒有發動一個全面性的革新，因而十年之中雖然在經濟發展方面陸續的作了許多工作，也得到了不少的成就，但整個環境還不能與現代經濟發展的要求相配合……」

他更進一步的指出：

「沒有從建立制度着手，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真是千古至言。古人講開國規模，首先便注重典章制度，因爲推動政務的一套機構便從這裏產生，同時也是施政與接受施政的規範。……但我們與經濟發展有密切關係的許多制度，始終沒有一個全面的配合，或徒具形式，沒有認真的去運用。」（尹仲容著：我對臺灣經濟的看法三編第七〇—七一頁）

「全面革新」與「從建立制度着手」當然遠超過尹仲容先生的職權範圍，他提出這些主張在於鼓動風潮，全國上下一心一德，步上建設現代臺灣的坦途。這些主張並未受到社會應有的注意，卻去爭論臺灣經濟是否已經起飛，實是不幸。四年以後，即民國五十二年，尹先

生抱負未展，淒然謝世。後一年，我於發表「臺灣經濟發展之路」一文，呼籲進行全面革新，建設現代臺灣；指出全面革新途徑；並警告國人「時乎不再，我們不能等」，「讓我們自動走上現代經濟和現代國家的路吧，不要讓情勢逼着我們走」以後，即退出實際工作崗位。再後二年，即民國五十六年元月，我去聯合國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工作，預備二年試用期滿得到終身任用後，即在海外安度餘年。對於推動全面革新，建立各種制度，以建設現代臺灣的抱負，至是完全放棄。不料在我離臺以後不久，全面革新運動忽告展開，距離尹仲容先生的公開呼籲已是八年以後的事了。

我是一個讀中國書讀到迂腐不化程度，極端內向，而又情感脆弱的人，雖然去國，但一出國門，眷懷宗邦之情便油然而生，見到有地方升國旗便熱淚盈眶，見到臺灣來的人便依依不捨。從報上看到國內在總統指示之下，進行全面革新工作，真是欣喜若狂。對於每一革新的消息我都不放過，並設想多種推動方法。但我逐漸發現國內所推動的革新工作，熱忱有餘，方法不足。我個人認為要革新成功，有兩個必備的條件：一個是貫徹到底的決心；一個是方法。對前者而言，既稱之為革新，便必須要付出代價，有所犧牲。要有氣魄付出代價，要有勇氣克服遭受犧牲者的抵抗與阻撓，便得靠執行革新者的決心。對後者而言，革舊佈新，絕不是一個簡單的事，也絕不是單憑一股熱忱與決心所能成事。既要革舊，便必須要對舊的作徹底的研究與了解，尋求真正癥結之所在，明瞭何以要革除舊的理由，更要明瞭舊的裏面有無值得保留的成份，抑或需全部革除。既要佈新，便要詳細研究我們當前的情勢與以

後若干年的需要，再參考其他進步國家的成例，以確定佈一個什麼樣的新。在將新舊兩者都弄清楚了以後，還要進一步衡量執行革舊佈新的條件：政治、社會、經濟環境如何；人才、財力如何，由此而決定革舊佈新的方法，務求代價與犧牲最低，時間最快，動蕩擾亂最小，而又能完全達到目的。

民國五十六年革新的第一個項目是教育，將國民教育延長三年。社會一致讚譽，說是從此可以消除惡補，這與我心目中的教育改革很有一段距離。我認為惡補、聯考、學不能致用等等現象都是病徵，不是病源，病源是我們的教育目標及制度與我們建設現代國家的需要完全脫了節。從表面上消除病徵不重要，從根本上消除病源才重要，而我認為消除病源的惟一途徑是徹底改變教育目標，全面革新教育制度。因於是年八月發表「從經濟發展觀點談我國教育制度」一文，這是在這一次革新運動中，我第一次就革新方法發言，反應不佳，但我衷懷坦蕩，並不介意。以後不談教育改革則已，否則恐怕還要走這一條路。

五十六年八月奉命返國一行，我認為中興在望，心情愉快，熱血澎湃，當即針對我們的環境與能力，以「如何打開經濟發展的新局面」為題，於九月間草擬了一個報告（附錄）呈送總統。這個報告雖是以經濟發展為題，實際上仍是一個全面革新的計劃與做法。在這個報告中我曾設計了一套以小敵大，長期備戰的辦法。這個報告全文未曾送達總統。

五十六、七年之間，我愈益感覺到革新方法之未能講求，乃藉國內熱心於編製國民經濟預算的機會，於五十七年二月發表「設專門機構編製國民經濟預算的商榷」一文，明白指出

革新方法不足，並即以編製國民預算爲例加以說明：

「去國一年期間，國內進行了許多影響深遠的革新工作，如能擴大範圍，持續三五年，必能激起年輕一代之共鳴，匯成革新洪流，使國家一舉而現代化，展望國家前途，無限光明。竄跡海外，覩此中興景象，光復大陸，榮旋故鄉，指日可待，直欲『漫卷詩書喜欲狂』了。惟正如 總統所指示，辦事必須科學化，換言之，即必須講求方法。否則熱忱有餘，方法不足，不但不能達成革新目標，且將因挫折而澆滅熱忱，則損失便無可估量了，效舉一例，希望執事諸公能反三才好」。

「政府宜就去年一年所提出的幾項革新工作，加上以後要推行的項目，串連在一起，變成有系統的一套革新工作，有適當的組織與人員主持其事，並向全國詳細說明政府意圖，使全民響應，變成一個革新運動」。

「既名之爲革新，則必然包含一些新觀念，新做法，是我們過去所未經歷過或不熟悉的。這時，應指派專人作徹底研究，檢討過去的情形，廣徵其他國家的先例，詳審當前的處境與需要作成結論。然後再進一步估量推行的條件與能力，包括人員、經費、立法、制度、機構，乃至民間政府官員接受的程度等，據以擬訂計劃，付諸實行。總之，一個基本原則：慎於策劃，勇於執行」。

在這一篇文章裏，我利用亞遠經會的圖書設備，旁徵博引，以求說服政府當局從政策與制度等根本上着眼，走上革新之路。由於措詞尖銳，引證又過於質直，反而使文章失去了作

用。

五十八年三月，再度奉命返國，發表了一篇文章：「論民生主義經濟制度的建立——爲革新工作舉一例」。在那篇文章裏我再剴切指出：

「這次革新，從範圍上講，應該是包括政治、經濟、社會等普及每一部門的全面革新；從程度上講，應該是深入思想、制度、及生活核心的徹底除舊佈新，這樣的一個革新，必須要有堅強結實的思想做基礎，必須要有明確清晰而又是力之所及的目標，必須要有把握關鍵達成目標的戰略，必須要有確實有效的方法。再由此而產生一套新的典章制度，運用這些制度的一套新機構，以及一套執行的新政策工具，然後再將所有這些都包括於一個簡單動人的口號之下，成爲一個運動，一如羅斯福總統的新政，甘迺迪總統的新境界之類。使海內外同胞知道我們的革新有理想，有目標，有做法，而這些理想、目標、做法又都具有我們的特色，是經過一番思考、融會、策劃、組織所形成，而不是隨意喊出的古典教條或時髦口號。唯有有思想，有目標，有做法的革新，在時間上才能持久，程度上才能深入，範圍上才夠普及。也唯有這樣的革新，才能激起全社會的共鳴，匯成革新的巨流，使革新生根」。

五十七、八年，臺灣物價有波動，農業問題漸趨嚴重，我對此問題的看法又與時賢的看法有極大距離，乃先後寫了幾篇文章闡明我的觀點。最後以五十八年十二月所發表的一篇「宜着手籌劃第二次土地改革」的文章作爲對此一問題的總結，在這些篇文章中，我仍然未脫

離全面革新與從建立制度，講求方法入手的老主張，這實是我終生抱負之所在。

民國五十九年元月我放棄在海外安度餘年的打算，辭去聯合國永久性的工作返國，亟思有所作為，發揮我之所長，以補政府之不足。是年春，奉到考察國內及日韓經濟的指示，我原想以十餘人組成一個包括所有與經濟發展有關的專家在內的一個龐大考察團體，我的打算將日本所有與經濟發展有關的政策、制度、執行情形等一次了解清楚，全部搬回來，整理分析，作為我們釐訂新政策與新制度的參考，也是「廣徵其他國家的先例」工作的一部分。不料我的用心未被了解，一再削減，最後是李登輝先生與我二人成行，陳清治先生自費在日本參加。

我在聯合國服務時，即已注意到日本與以色列的經濟發展可能對我國有極大的參考價值，廣事收集兩國的經濟發展資料。以色列的資料極少，可說沒有，我翻遍了亞遠經會圖書館以色列的資料，訪問以色列駐曼谷的經濟參事，以聯合國官員身分寫信給以色列有關機關，均無效果。日本的資料較多，我不放過每一件經過我手的或我知道的日本經濟文件，故對日本經濟發展早已有所了解，考察只不過親身印證而已。考察返國後，我寫了一本「韓國日本與國內經濟考察報告」，連同李登輝陳清治兩先生的報告一併分送有關各方面。這是我的精心之作，曾擇要寫成「日本這個太陽是如何升起來的」一文，公開發表，希望政府及社會有關人士對日本經濟發展有所認識，對我們的經濟發展有所幫助。迄今我仍認為這個報告及這篇文章值得經濟財政金融當局仔細研讀。

以下所選出的二十四篇文章及附錄，都是自民國五十三年元月以後所發表或未曾發表的。在該時以前我甚少寫文章，偶應別人之請寫文章，也是以王方回的筆名發表。所有文章均係針對臺灣當時所發生的重要經濟問題而寫，僅有兩篇係報導日韓經濟發展，但目的亦在供臺灣經濟發展的參考。絕大部分都是作者自動寫出投刊各報，僅有幾篇係應酬之作，但亦認真撰寫。作者在撰寫時，純就對當時問題的看法立論，從不參閱以前的文章，但自信仍能前後一貫，自成體系，可能前後偶有矛盾之處，這當然是作者的過失。

大部分較有份量的文章都是在國外撰寫，或觀念的形成是在國外。附錄亦是在國外孕育的觀念返國以後所寫成的報告。「臺灣經濟發展之路」係赴美進修的報告改寫而成的。我每次出國都是隻身前往，旅居寂寞，而國外感觸甚多，亟盼國家強盛，成為現代國家，因此容易想到臺灣的問題。尤其旅居曼谷的三年，每天晚飯後在泰國國會大廈前面廣闊的道路上散步，夕陽殘照，寂靜無人，老樹舊垣，景色淒其，隻影徘徊，每有海外飄零之感，不勝故國河山之思，於是臺灣的許多問題便自然浮現於心頭，設想各種解決途徑，日夜縈繞，不寫出來思想不能停止。返國以後，人事紛紜，便很難執筆了，即令執筆，也寫不出令人滿意的東西。

這些篇文章雖然討論主題與表達方式不同，但差不多每篇都含帶着我的中心思想的色彩：在擁護政府，維持既有的政治與社會秩序之下，盡最大努力，在最短的時間內，做到最大可能的變革，建設一個現代的國家。而達到這一目標的方法則是以發展工業，特別是重工

業，作為建設現代經濟的核心，再以建設現代經濟作為帶動整個國家現代化的動力。為了發展工業，為了建設現代經濟，為了帶動整個國家現代化，就必須要剷除一切阻礙，佈置一個有利於達成目標的新環境。落後國家現代化的主要阻礙來自農業社會的傳統觀念與由是而形成的典章制度，因而所謂佈置新環境也就是灌輸現代工業社會的新觀念與建立新的典章制度。所以在所有的文章中，都充滿了強烈的打破舊觀念，剷除舊的典章制度，接受新觀念，與形成新的典章制度的主張與要求，也就是文章中所一再提及的全面革新。為求引起政府及社會的注意，能在不利的大環境中及時採取行動，不致為時太晚，我在文章中慷慨陳詞，反復警解，一再使用重疊的字句與高度刺激性的語氣。時間一久，便形成了我的文章的一種風格。

我為什麼在目前這種環境中主張建設一個現代國家呢？原因之一是在我們政府遷臺以後的處境之下，要想做到「立國之道操之在我則存」的境地，除建設一個像以色列那樣強盛有力的現代國家外，實無第二條路好走，請問誰能指出第二條路呢？所以為自強圖存，我們要建立一個現代國家。原因之二，也許是一個更基本的原因，是建設一個現代的國家不僅是我一個人一時的願望，而是自戊戌維新將近百年以來所有良知未泯的中國知識份子的共同願望，特別是出身農村而又在國外接受現代教育的知識份子，感受尤其強烈，態度也就更為積極，而對政府的要求就愈為嚴格。但這些知識份子大部分既無權勢欲望，更無政治野心，潔身自愛，動機純正，應為一個正常的社會所容忍。

從上面的敘述，可知我多年來的發言立論自有主張與準繩，自有成套的看法與體系，無論是愉悅的讚揚與嚴峻的批評，都有其客觀的標準存在，而且對事不對人。既不有意抨擊政府以譁眾取寵，亦不居心逢迎當局以爭名求利，所有這些讀者都可從所選刊的文章中很明白的看出來。這種態度無疑要開罪許多人，引起許多誤會，而爲我帶來許多不方便，但我從不後悔，苟利國家，知我罪我，都非所計。至於認爲我蓄意作某種主張，以求損害他人，達到自己的目的，那是低看我的人格與抱負，不值一辯了。

王作榮序

民國六十一年八月
於臺灣大學

目錄

1	增訂再版序
3	初版自序
1	台灣經濟發展之路
54	對誘導游資於生產事業之商榷
61	澄清幾個當前的經濟問題
69	台灣經濟建設的長期目標
87	政府支出與人民負擔
93	如何認識及改進證券市場
105	現階段經濟動員的型態與做法
118	論重工業的建立
126	從經濟發展觀點談我國教育制度
138	台灣今後經濟發展的路線
145	設專門機構編製國民經濟預算的商榷